

故人入我梦

张志民 著



故人入我梦

张志民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铮
一

1029425

故 人 入 我 梦

张 志 明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0,000 印张：8.75 字数：1—13,1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99

定价：(平装)1.05元 (简易精装)1.15元

目 录

延安纺车声	
——吴伯萧同志二三事	1
怀萧三	7
故人入我梦	
——念诗友李季	17
我们年轻的时候	25
最远，也最近	33
北疆见闻	
——致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	44
罗行记趣	50
“公安老李”	63
赴汤蹈火	
——记消防民警刘洪全同志	84
海上公安员	100
一条宽阔的道路	109

祖国，你的儿子在前线	131
在阵地前沿	143
英雄的报告	153
平凡而伟大的人们	165
桥	172
乐在其中	178
新生的花朵	187
源 泉	194
正义必胜	200
英雄与祖国	208
打不倒的人	216
子弟兵	
——春耕散记	242
婆媳话	247
瞎 群	250
新书人	254
北上漫记	259
想天津	270
后 记	276

延安纺车声

——吴伯箫同志二三事

吴伯箫同志离开了我们，我又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战友，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。

和伯箫老师相见，是一九五四年 的事，那时候，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，伯箫同志曾是我们的主任。其实，认识他的时间，还要更早些，远在解放区的时候，从他的散文中，对这位老师，就已经深有印象了，知道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，而且是一位有特色的文学家。

他的文章质朴、味厚，他把深厚的感情，熔铸在朴素的文字里，从不使用什么华丽的词藻，从不多加一点可有可无的装饰。那简洁的语言、淡雅的叙述，象一位身穿土布裤褂、家做布鞋的村姑，她脸上没有脂粉，但那种自然的美、那种天然的健康，比艳丽的浓妆，不知要胜过多少倍。

五十年代初，伯箫同志就已是年近半百的人

了，在我的面前，自然是个长辈。每同他谈话，我不免带一点后辈的拘谨，但这种拘谨，常被他平易近人的态度，一扫而光，几句话之后，你会感到他和你之间，并没有隔着年龄或师生的距离，全然象是自己的朋友。

可惜的是，这段时间内，我们私人间的来往并不很多。伯箫同志成为我真正的朋友，还是近些年的事。

或许正因为“近”吧！他的逝世，使我越发感到突然。摆在我眼前的，分明是伯箫同志逝世的讣告，我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那些昨天的情景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

伯箫同志坐在他十分简朴的办公室里，他不吸烟，不饮茶，自己喝着一杯白开水，但与我相谈的兴味，却浓过任何香茶、醇酒。他直率的言词，他深沉的思索，他敞心的憨笑，他醒人的警句……每次相谈，都给我很大的教益。

“不要给人民添任何麻烦，不通知亲友，不举行任何仪式。”这是讣告中发出的他最后的遗嘱！多么象他的语言，象他的人呵！我噙着眼泪读了这几句遗言，只恨自己，在外出之前，虽然写了信给他，却没能设法去看看他。尽管有人告诉我，怕打扰他的情绪，影响治疗，不准探视，但站在窗口望一眼，也总不会成为永生的遗憾啊！

夜深了，我打开书橱，检点着伯箫同志给我的书信，“相识二十四年，昨天得获第一次畅谈，是新春佳节一大快事……”

我看着伯箫同志那苍劲有力的手迹，看着那封信的日期：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四日。

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，我和伯箫同志的接触，日渐多起来。我们相谈的话题很广，人人事事，岁月流年，从个人的历史到十年内乱，讲到各自的遭遇，但均无悲戚之诉。伯箫同志以风趣的语言，向我叙述着，当他无处可交党费的时候，是怎么用红塑料布，在床头的墙壁上，钉下一个装党费的口袋，每个月，他向这个无人管理的口袋，投一次党费。

说到这里，伯箫同志收住了自己的笑容，从事过语文教学工作的伯箫老师，是很注重语言简练的，他用两个字，概括了那场灾难：“胡闹！”

我们的交往日深，而且，就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俩多次一块开会，有一次，还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，朝夕相处了。

这时，伯箫同志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。由于教科书的编审任务很紧，他每日半天在宾馆开会，半天回机关办公。两地相距甚远，他每天跑来跑去，连午觉都不得睡，常是匆匆吃几口饭，撂下饭碗，提上文件包就走。这

时，伯箫同志已年过七十了，我感到他很辛苦，原以为这位文研所的领导同志总会有车子接送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很少要车，老人每天去挤公共汽车，途中要行走近一小时。

有一天，他刚刚出门，便下起大雨，机关打来电话，要伯箫同志等一下，马上派车来接。我手里的耳机还没有放下，隔窗望去，老人披件雨衣，在瓢泼大雨中，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了！

熟悉一个人，确非一朝之事。和伯箫同志相识二十几年，他可亲可敬的形象，是我从一件件小事、细节，在日积月累中，逐渐完臻的。伯箫同志是我们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他不仅仅在我国文学宝库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，在教育事业上有着卓越的成就，而且作为一位老同志、老党员，他作风正派，表里如一，对同志诚挚热情，不愧是我们的师表。许多事情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读过我的《边区的山》，他写过一封十分热情的、鼓励我的信，信中还引了一些诗句。这封信，我读过几遍，最后一遍，才发现他在一个“啊”字旁边，用铅笔轻轻地写下两个小字：“可省”，这件事，给我很大教育，七十几岁的老人，竟是这样仔细的读一个晚辈的作品，而我自己却常常粗枝大叶，缺少他那种精神。

不久之后，突然又收到伯箫同志的信，他告诉我，《广播节目报》的预告中，有《边区的山》的配乐朗诵，而且告诉我时间，是某月某日的八点二十分。他在百忙的工作中，还这样热心细致的关心别人的事。从那张整洁的信纸，从那笔体工整一丝不苟的每一个字上，我感到了老人的脉搏、体温。

由这些，我更联想到许多细事：为了排字工人的方便，他所改过的文稿小样，每一个标点都十分清楚；在一起同住时，为了不影 响 我的睡眠，他夜间起来，从不开灯；那样大的年纪了，工作一天，本来已十分疲惫，但他必须读过当天的报纸，才得入睡，从不因为精神不好，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。

《说苑》有语：能言者未必能行！伯箫同志是说到便做到的，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，处处以身作则，包括对自己的子女。

伯箫同志离开了我们，此时此刻的分手，使我倍感沉痛，一想到他可亲可敬的形象，就不禁深深感叹：今天，我们的事业，多么需要象伯箫同志这样勤勤恳恳，不图名，不为利，甘作人民公仆的实干家啊！

写到这里，我翻看着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伯箫同志送我的再版散文集《北极星》。收到这

本书后，我曾写给他几句小诗：

抬头又见北极星，
耳边顿起纺车声^①，
佳作重印似出土，
经窖美酒香更浓。
落墨叮咚延水响，
质朴无华宝塔风，
甘作齿轮唱实践，
速打背包赶新程^②。

伯箫同志和我们永别了，但他的纺车声还响
在我们耳边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

①指吴伯箫的散文《记一辆纺车》。

②指吴伯箫的散文《齿轮和螺丝钉》、《从实际出发》。

怀萧三

去冬，北京地区少雪，天气反常，许多慢性病人，都不大适应这种气候，因我自己也是个病号，对此是深有体会的。特别是将近年关的几天，天气骤冷，作内科医生的女儿，每天下班回来，都向我说一些她们的住院病人中那种令人不快的消息……

每听到这些，都使我心头一紧！自然地会想到，久卧病榻，年逾八十，靠人工制造的气管，日夜在和死神搏斗的萧三同志。老人家在半年之内，已是几度危机，又几度得救了，近一段时间内，情况如何？尽管我曾几次去探望过，不久之前，还从其他同志那里打问过老人的情况，听说已经可以到阳台上去踱步了，并且还准备与乔木同志和诗哩！

情况好转，我听了很高兴，不过，心里仍是难以踏实下来。俗话说“七十不走亲，八十不宿店”，年过古稀之人，谁也难料到那瞬间的意

外。

“不会的！萧老的意志格外坚强，他还准备来春出院，去整理他那许多日记哩……”我满怀信心地安慰着自己，并准备着在大年三十之前去医院看望他，想告诉他前些时我和王蒙同志一起去老区农村的一些见闻。农村政策改革的形势愈来愈好，老区的农民们富起来了，小山沟的姑娘们，也穿起皮鞋、大衣，有的村子，还修了澡堂，农民可以洗澡了……

这些令人愉快的好消息，萧老听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照巴甫洛夫的学说，这叫作“良性刺激”，中国人叫作“宽心话”，精神疗法，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神效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那带来不幸消息的讣告摆在了我的桌子上，尊敬的萧三同志，和我们永别了！

苦涩的泪水，漫过双眼，眼前的几行小字渐渐地，变成一堆杂乱的线条……萧老啊！难道你真地走了……真的！这是不可怀疑的、实实在在的现实。他老人家，真地离开了我们，他闭上了双眼，永远地……闭上了……

今年萧老八十六岁了，他十月生辰，再过半年多，就该是八十七了，在中国，已属高寿，理智地去想，这一天已在人们的预料之中，但它真地

到来了，却又使人感到那么突然！萧老！没几天就是春节，你为什么不再过一度我们民族的盛节呢！还差几天，只差几天呀！

我坐下来，在哀痛中，尽力使自己冷静些，想着那一幕幕的往事。其实，这些事，几年之内，我已想过多少遍了。

是由于历史的偶合吗？使我有机会接触萧三同志，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长者，得到他许多教益。也是由于历史的偶合吧！我们同尝过一段甘苦，这几年，萧老多病，由于种种不便，有些心境，我对他老人家也没有谈过，无情的事实，使我再也不可能向他倾吐，写在这里，作为对老人的追念吧！

我和萧三同志的往来，是从四十年代在解放区时开始的。那是一九四七年秋，我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中，写了叙事诗《王九诉苦》，发表于《察哈尔日报》的文艺副刊。不久，其他解放区的报纸，转载了这篇诗。此后我又写了《死不着》，仍给了《察哈尔日报》，很快即发表了。在发表《死不着》的同一版上，转载了萧三同志发表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上的一篇介绍《王九诉苦》的短文：《我读了一首好诗》。

这时，我刚二十一岁，虽发表过一点点东西，仍还是个十分幼稚的文学青年，我不在文艺

界，而是在部队作实际工作，和边区当时的作家们，没有多少往来。战争年代，通信困难，各解放区之间，交通也不方便，我没有见过萧三同志，也不知他的具体情况，只知道萧三同志是我们的革命前辈，诗歌前辈，很长时间在国外工作。他翻译过《国际歌》；大家都熟知的剧本《前线》，也是他翻译的。对于萧三同志的其他作品，能读到的，就很少了。

一个初踏文学之门的年轻人，得到前辈诗人的鼓励，那种心情，也正象我们今天的青年作者得到老一辈作家的帮助一样，一是感激前辈关怀，二是感到自己的笔头更沉了些，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，不要辜负老一辈和读者的希望。但迈出新的一步，是很难的呀！记得在给萧三同志的信中，我曾谈过这种心情。

这段时期内，萧三同志给过我几封信，每封信，都是辗转多日，才寄到我手中的。他鼓励我说：“当教导员很好！”他要我安心在部队作实际工作，作工作和写东西，没有什么矛盾，正好是对自己的锻炼，写诗需要生活，鼓励我要较长期地滚在生活之中。

这些用边区麻纸写成的信，在转战千里的路上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有的磨成了几片，我又重新粘裱起来。它们伴随我二十来年，可惜在十

年浩劫之中，全部都没有下落了！

那时，哪还顾得了几页书信，我长期不能回家，萧三同志已被投入监狱，不久，我也“进去了”，而且，向我宣布的所谓“罪名”中，其中有一条便是“和萧三的关系”。

“交代你们的关系！”这种呵斥声，早在入狱之前我已听过无数次了。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！无非是我把萧三同志看作是革命前辈，对他很尊敬；他把我作为后来者之一予以关心。谁想到，为这个“关系”，在几年之内，记不清曾有过多少次的“提审”。因为我拒绝在萧三的名字前面加那个“帽子”，竟对我从早到晚，一连几日地搞“车轮战”！

熬过了那些罪恶的岁月，在十年之后当我重新和萧老相见时，提起这些往事，真可谓让人哭笑不得！

萧老久久地握住我的手，半晌无话，该说些什么呢？那次相见，正如老人家在《死不着》新版序言中说：“眼前就不禁模糊起来……”，老人只有深深地感叹：“想不到，连你也受到株连……我的朋友们，都很好啊，竟没有一个胡说八道的……”

当时萧老虽已获自由，但还没给作“结论”。老人家精神很好，但身体却十分虚弱，我扶老人

家坐下来，为着不给对方招来辛酸，双方都有意识地绕开那段时日的话题，我们谈别的事。萧老告诉我，他正在写东西，还准备重编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因为又新发现了一些烈士的遗作。告诉我，他有许多的日记还需要整理，并且风趣地说：“很好，因祸得福！他们把我那些东西当作‘罪证’，一件件都编了号，锁在保险柜里，要不，也保存不下来……我得感谢他们啊！”

我问：“日记从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从二十年代起……”

“到什么时候？”

萧老笑笑说：“到今天……不死……明天还写……”

我望着老人那炯炯有神的双眼；那谈笑风生、平易可亲的神态；那讲事实从不含糊其词的作风；那语言诙谐、善吐真言的诗人气质……萧三同志，他还是和十年前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啊！

怕影响萧三同志休息，我几次站起要走，但他又几次地把我留住，象是有多少话要说。实在也是这样啊！我俩前楼、后楼同监关押，身隔咫尺，经受了同样遭遇，而老人家所吃的苦头，更甚于我几倍。好几年的话，好几个秋天的“收获”，只把长的“小布袋”，怎么装得了呢？

我还是现实些吧，萧老的健康要紧，不允许